

## 学海堂与今文经学在广州的兴起\*

[美] 艾尔曼(著), 车行健(译)

(普林斯顿大学, 东亚研究系, 美国 普林斯顿)

[摘要] 本文旨在探究学海堂与经今文学的关系, 作者首先分析阮元创设学海堂的过程及其组织特色; 其次, 作者指出学海堂兼容汉学与宋学、古文与今文的学风, 而此多元的教育机构的出现也使广东成为清代经学的最前线。

[关键词] 学海堂; 阮元; 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 汉学; 宋学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06)02-0013-08

### The Hsueh - hai T 'ang and the Rise of New Text Scholarship in Canton

Benjamin A. Elman

(East Asian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U. S.)

**Abstract:** The gist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qui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sueh - hai T 'an and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the first plac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Hsueh - hai T 'an and its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econdl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Hsueh - hai T 'an was compatible with the style of study of Hang Learning, Sung Learning, Old Text Confucianism and New Text Confucianism; besides, the appearance of this many - side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made Kwangtung become the forefront of Ch 'ing classical scholarship.

**Key words:** Hsueh - hai T 'an; Juan Yuan; New Text Confucianism; Old Text Confucianism; Hang Learning; Sung Learning

### 一 前言

学术与教育透过其学问体制来传播之方式, 是理解一个文化社群(cultural community)之持续恒久面向的重要线索。尽管已有罗斯基(Evelyn Rawsh)的拓荒之作:《清代中国的教育与大众识字能力》(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但仍在吾人对清代研究中留下了相当大未开辟的领域。在下面的篇幅中, 我的主要目标将聚焦在 19 世纪中后期的广州。在这段期间, 阮元(1764 - 1849)所创设的学海堂开始招生, 并且迅速成为广州最负盛名的书院。

既有的许多关于学海堂的文献称其为主流儒家的学术中心, 琼斯(Susan Mann Jones)和孔复礼(Phil Kuhn)最近曾将它描述为《一群同时是诗人和学者的军事战略家, 在中国南疆的商业城市里任

\* [收稿日期] 2005 - 02 - 18

[作者简介]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 (1946 - ) 男, 美国人,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1000 - 1900); 中国科学史(1600 - 1930); 晚期中华帝国教育史; 中日文化史(1600 - 1850)。译者: 车行健(1966 - ) 男, 台湾台南人, 台湾东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经典解释学; 中国经学史; 先秦两汉学术。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Tilemallil Grim, "Academies and Urban Systems in Kwangtung,"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G. Wm. Skinner (施坚雅)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77) pp. 489 - 90. (译案: 中译本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 王旭等译,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教所在的一小块飞地(enclave)》,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则首次将广州的学海堂与越华书院称为广东高级官僚的智库。近来魏氏更把阮元与学海堂和广州成为公羊学的主要中心联系在一起。

当时的广州将成为包括鸦片战争以及后来风起云涌的改革与革命风潮等诸多事件的中心。然而,必须谨记在心的是,当19世纪初学海堂创立时,广州仍是一个知识落后的地方。与富庶的长江下游江浙一带相较,在鸦片战争前,广东的外出人才与拥有进士资格者在数量上是远远落后的。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学海堂创设于临时的处所,且在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筑堂于北城外的粤秀山后开始招生,这在广州产生了广为人知的巨大的影响。当阮元在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年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时,他所带来的一批江浙学者促进了当地教育的重建。在若干办学优异的书院的基础上,学海堂成为教育体系中的学术领导中心。

## 二 学海堂的创设

出生于江苏大运河边上繁荣的文化商业中心的扬州,阮元在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首次被任

命为山东学政时,即已接触教育的事务。当汉学的潮流在江苏一带的长江下游的教育中心达到高峰时,热衷汉学的阮元襄助时任山东巡抚的毕沅(1730-1797),毕沅本人也是一位突出的汉学尊奉者和赞助者。阮元在山东的任内重建了纪念东汉学者郑玄(127-200)的祠墓。

在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阮元年仅31岁时,又被调任到浙江担任学政,他开启了协助、推荐和拔举学者的模式,而终其任职期间,这个模式一直持续着。阮元选用超过四十位的浙江汉学家,在他的指导下纂修了一本题为《经籍纂诂》的经学词典,目的在恢复唐代以前儒家经典的注疏。这本依循《雨雅》传统的词典是最完备的同义字与古代词汇的集成。阮元也对收集善本书的藏书楼的维持极有兴趣,<sup>⑩</sup>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他命闻名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的主人编录其藏书目录,<sup>⑪</sup>不久之后阮元也选择杭州的灵隐寺和位于长江口的焦山寺来贮藏珍稀图书。<sup>⑫</sup>

阮元于嘉庆四年(公元1799)从北京返回浙江奉命署理浙江巡抚事务(嘉庆五年实授浙江巡抚),他重新处理他学政任内没完成的工作。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他利用当初在杭州编纂《经籍纂诂》

Jones & Kuhn, "Dynasty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Part I edited by John Fairbank (费正清)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8), p. 160. (译案:中译本见《剑桥中国史》,张玉法主译,台北:南天书局,1987年初版),第10册,《晚清篇上》,第3章,页185。

Wakeman (魏斐德), *Strangers at the Gate*.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 182. (译案:中译本为《大门口的陌生人》,王小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Wakeman (魏斐德), *History and Will*.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113. (译案:中译本为《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郑大华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魏氏的叙述是有启示性的,但论据则过于薄弱。魏氏错误地指称学海堂在《皇清经解》中刊刻了龚自珍的著作,其实魏氏所指的原是由王先谦(1842—1918)于光绪十二年(1886)至十四年(1888)间编辑,且在江阴的南青书院所刊刻的《皇清经解续编》,其中就收录了龚自珍的一些著作。此外,重要的是,一般对阮元的认识或想像(见第三节),都不足以断定他曾自觉地提倡公羊学。举例来说,林则徐长期被认为曾受惠于公羊学,但这种说法并没有足够的文献证据支持。参见魏氏在《剑桥中国史》第十册《晚清篇上》所写的《广州贸易与鸦片战争》章,页217-180。

Ping-ti Ho (何炳棣):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N. Y.: Science Editions, 1964), pp. 96, 228; 又参麓保孝:《清末に於ける岭南儒風》,收在氏撰《宋元明清近世儒學變遷史論》(东京:国书刊行会,1976),页211。

《广州府志》(光绪五年刊本),卷66,页19b; 又参铃木中正:《清末攘外运动の起原》,《史学杂志》,62卷10期(1953年10月),页12-13。

陈东原:《清代书院风气之变透》,《学风》,3卷5期(1933年6月),页17,安徽省立图书馆刊行。又参 Tilemann Grim, "Academies and Urban Systems in Kwangtung," p. 489; 麓保孝:《清末に於ける岭南の儒風》,页211-12。

汉学通常被视为反对宋明新儒学哲学的一种学术形态,强调回归汉代经学诠释的研究,因为汉代经学较接近经书制成的年代,更能揭示经书所蕴含的本义。清代盛行的归纳方法通常被视为汉学的同义词。基于我在下文所提出的理由(见第三节),考证方法对我来说并不似乎是汉学的专利,本文所使用的《汉学》不能和《考证学》自动互换。我认为后者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论述领域,通常也包括清代宋学。关于汉学意含的其它难题是东汉和西汉学术的界限,今古文之争是其中的关键。十八世纪所谓的《汉学》倾向关注东汉经学的注解,特别是郑玄的经注。基于这个理由,汉学通常被简单地称做《郑学》。以下所使用的另一个汉学的意含,实际上指的是与回归《西汉学术》的今文经学相对立《东汉学术》。

阮元:《重修高密郑公祠碑》,《翠经室集》(台北:世界书局,1967),四集,卷2,页681-820。

孙星衍等:《诂经精舍题名碑记》,收在阮元所编《诂经精舍文集》,页2。此书可在《后书集成简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中找到。

⑩ A. von Rosthom, "The Erh - ya and Other Synonymicons," i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0, 3 (Oct. 1975): 140.

⑪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a Period, edited by Arthur Hummel (恒慕义) (Taipei: Cheng Wen Pub. Co., 1972), p. 400. (译案:中译本为《清代名人传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⑫ Cheuk - woon Taam (谭卓垣),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Taipei: Chinese Material Center, 1977), pp. 74 - 75. (译案:中译本为《清代藏书楼发展史》,徐雁译,谭华军点校,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的房舍成立诂经精舍。阮元在山东任内时已经表达了他对郑玄的景仰,此时他创立诂经精舍是为了纪念郑玄与以《说文解字》闻名的东汉学者许慎(30-124)。阮元使用“精舍”一词是因为此为汉代生徒求学时所居之名。

陈东原曾将阮元对话经精舍的创建描述为“书院历史划分时代的一个可纪念的年代”,下文拟先略宕开一笔,这将有助于对陈东原这句赞誉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由于害怕反满主强的滋长,清初皇帝禁止那些有可能会效法晚明高度涉入政治的新的私人书院成立。然而在经过大约九十年的中断后,雍正皇帝在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倡导各省设立官立书院的政策,存公银两用于帮助建设新的学舍以及寄居在书院中的学者与学生的膏火资,起初在十八行省一共设立了二十一所书院。

这项政策产生了三种志趣与导向各异的书院型能。第一种是那些从明朝灭亡以来仍然幸存的以宋明新儒学为宗的小型私人书院,这类书院很快地被县、府与省所设立的官立书院超越。这类第二种形态的书院迅速地被引入科举考试的轨道中。在社学、义学、府学与县学的养士教育系统的顶端,这类书院提供士子熟悉八股文(时文)写作技巧的训练,胜任于此可使其在科举和仕途中获得成功。早先的时候,学生习惯于去阅读与记诵书肆出版的时文选集,于是就有不少人担心这可能会造成剽窃的风气。许多人认为士子不再研经阅史,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学会如何将范文稍做改变而成为他们应试的

文章。

为了回应此种的教育危机,第三种形态的书院便在十九世纪初应运而生了。这类书院致力于经书经文与注疏以及史传本身,而非只为了应试。阮元的诂经精舍为此类型的书院提供了典范与刺激。阮元努力将经书教育与实学的主张结合,而他同时也是业余的科学赞助者,他要求诂经精舍的学生除了原本的课业之外,也须通过天文学、算学与地理学的考试。

阮元设立学海堂沿着杭州诂经精舍相同的方针。为了扭转当时仍盛行于广州的宋明儒学的风气,阮元规定在学海堂的经学与史学的学习必须附加实学的研究,包括天文学与算学。有学海堂与诂经精舍作为范例,以尊崇经学与实学教育的书院开始在各处兴盛起来。

以科举制度为导向的教育无法因应中国官员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这样的认知早在西方压力突显之前的数十年就有了。出于对清朝行政体系内部问题的关切,阮元、陶澍(1779-1839)及贺长龄(1785-1848)以及其它省级官员已经警觉到教育和官僚体制改革的需要。

阮元打破一般书院的组织,替学海堂设立了八个“学长”,以取代通行的单一“山长”的做法。阮元自己对此曾有所说明:“……此堂专勉实学,必须八学长各用所长,协力启导,庶望人才日起”。<sup>⑩</sup>

学生是从广东各地精挑细选出来的,而且主要是从广州其它书院招来的。这些学生在成为学海堂的专课生或附课生之前,至少要有贡生资格,童生则

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集》,二集,卷7,页505。宋代书院的命名常是为了尊崇宋代新儒学大师,而明代书院则常推尊王阳明:见谭卓垣上引书,页89。

陈东原:《清代书院风气之变透》,页17,18。

关于清代书院比较平衡的讨论可参见林友春:《清朝の书院教育》,《学习院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第6辑(1959),页177-97;小野和子:《清初の思想统制をめぐって》,《东洋史研究》,18卷3期(1959年12月),页99-123,聚焦于清初对长江下游书院的压制,同样可参看大久保英子在她的《明清时代书院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6)页13-41中的讨论。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页154-57;较完整的讨论请参林友春:《清朝の书院教育》,页187-191。

kung - chuan Hsiao (萧公权),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pp. 235-40.

关于反对以举业为道向的书院的讨论请参 Wolfgang Franke (傅吾康):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60), pp. 19-27。

孙星衍等:《诂经精舍题名碑记》,页2。大约在此时,阮元对天文学和算学产生了兴趣,而其成果就是其所撰的《畴人传》于嘉庆四年(1799)刊行。Nathan Sivin 将其描述为“传传统方天文学的实用的综合,用意是藉由鼓励后者的研究而促使前者进步。”参 Sivin, “Copernicus in China”, in *Colloquia Copernica: Etudes sur l'Audience de la Thorie Heliocent* (Warsaw: Un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rie et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1973), p. 99. 阮元的兴趣标志着清代知识群体正处于上升阶段的最高峰,因而天文学与算学的价值再被确认为儒学教育的一环。

何佑森:《阮元的经学及其治学方法》,《故宫文献》,2卷1期(1970年12月),页22。

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长江下游经由大运河至北京的漕运之崩溃、军政的改革、地方叛乱的平定,以及进防与海防,参 Kuhn & Jones,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Part 1, pp. 107-44。

⑩ 容肇祖:《学海堂考》,《暨南学报》,3卷4期(1934年6月),页19。

不被接受。这意味着学海堂只接受通过科举考试而已经取得士绅资格的学生。虽然学海堂并不给予考试的训练,但学生们仍被期望藉由公职生涯所需的科举考试来延续他们的志业。

官府资助、商人捐资及田地租息的收入,使得学海堂的学生可以每月领取膏火银,此外也会针对表现杰出的学生与课卷发放奖银。优秀的课卷会跟八位学长的诗文一起刊刻在书院的文集上。学生规定将每日所习填注于日程簿内,每个月学生和学长也会在一起聚餐,并讨论学习成果。

学长每月授课两次,并为课程拟定题目。每岁分为四课,每课由两学长经管,周而复始。道光十四年(1834)之后,学生须封从经书、史书、诗文集或《朱子大全集》中自择一书进行深入研究。

阮元曾在杭州建立诂经精舍以推尊郑玄、许慎这二位东汉古文经学家,他延续推尊后汉学者来兴建书院这样的模式,以东汉今文学家何休(129 - 182)“学海”的称号(因其博学)来替学海堂命名。与何休同时且为其主要竞争对手的郑玄则有“经神”之称。

不同于他那位大名鼎鼎的对手,何休是《公羊传》以及由董仲舒(公元前1797 - 93)创建,在东汉被视为正统儒学的今文经学的坚定捍卫者。除了撰写那部深具影响力而为十八世纪常州学派所倚重的《公羊解诂》之外,何休还写了三篇尖刻的文章来抨击古文经学对《春秋》与孔子关系所持的立场。郑玄也回击以同样辛辣的文章来替古文经辩让。和

清代一样,东汉的今古文之争也集中在《公羊传》上。

徐荣(1792 - 1855)是学海堂初起时的八位学长中的一位,他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为学海堂在粤秀山上新建堂舍的启用作了一首诗,诗中他捕捉到了阮元为学海堂命名的意涵:

碧玉楼高不可寻,南园南望莽萧森,  
清泉精舍无遗址,宝月孤台孰嗣音;  
百代渊源前日事,千间广厦古人心,  
会将两汉公羊学,直扫浮华见古今。

除了赞助研究《公羊传》的学者之外,阮元本人似乎也对《公羊传》产生了兴趣。阮元在为孔广森(1752 - 1786)的《春秋公羊通义》作的序(收录在学海堂刊刻的阮元文集)中回溯了公羊学的流传,并且描述了其在清代复兴之前的盛衰兴废。他指出孔广森对于公羊义例的诠释有四处与何休的《公羊解诂》不同,而在结论中阮元察觉到《公羊传》在阐明孔子书于《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上,比《左传》更为出色。阮元这篇老生常谈的序文并没有传达其它讯息,只是表现出他对《公羊传》的一般兴趣。

### 三 学海堂的学术

一般人习惯把十九世纪初的改革运动与今文经学的兴起联系在一起。近来学界关于魏源(1794 - 1856)投身今文经学以及公羊理念在其经世主张所扮演角色的研究,已将这种联系加以分析阐明了。<sup>⑩</sup>一般总会假定这样一种传承上的直接历史线索:即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历书编审委员会,1958),页276-77

见同上。学海堂的部分基金是采自当地的商人,包括了来自资深行商伍秉器(1769 - 1843,浩官[Howqa],译案:浩官为西方人封伍家商人的称呼。)的一笔相当大的捐资,参大久保英子:《明清时代书院の研究》,页337。这件事是指控阮元在广州推行的反鸦片政策无法彻底实现的基础。事实上,这关系到到许乃济在道光十六年(1836)所上的著名的奏折,其中建议将鸦片全面合法化,除了官员、士子、兵丁等之外。此外,吴菊修(学海堂在道光六年(1826)的学长)也曾主张对鸦片贸易弛禁。熊景星(学海堂在道光六年(1826)的学长)和俄克中(学海堂在道光十四年(1834)的学长)皆会被引证做林则徐来到广州之前的这段期间,行商对鸦片政策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的证据。参演口富士雄:《方东树の汉学批判について》,《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0期(1978年12月),页174-76;又见Peter Fay,《The Opium War》(Chapel Hill: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5), pp. 47-48 and Wakeman, “The Canton Trade and the Opium War”, pp. 178-85。此外也须注意伍崇曜(1816 - 1863),在接下其父浩官的位置之后,对学海堂学者谭莹(1800 - 1871,学海堂在道光十八年(1838)的学长的)赞助。在谭莹的指引下,伍氏家族的藏书被拿来刊刻了大量的典籍和业书,参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ng Period, pp. 867-680。从贩售鸦片中所得到的收益似乎是伍氏家族庞大的财富和藏书的主要根基,请参照社维运:《学术与世变》(台北:环宇出版社,1971),页135。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世界书局,1972),第1册,页13。(译案:原文作《每月朔学长学生会食,并出其日记以相校正。》)

容肇祖:《学海堂考》,页200。

阮元:《学海堂集序》,页1b-2a。

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台北:广文书局,1978),页221-75。

何休这三篇文章是:《左氏膏肓》、《斲梁废疾》、《公羊墨守》。郑玄还击的三篇文章是:《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学海堂集》,卷16,页22a-23a。

阮元:《春秋公羊通义序》,《瞿经室集》,一集,卷11,页222-240。身为孔子后裔的孔广森有一段时间曾受学于壮存与,参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第2册,页599。

⑩ Peter Mitchell, “The Limits of Reformism: Wei Yuan’s Reaction to Western Intrusion”, in *Modern Asian Studies*, 6, 2 (1972): 178. 大谷敏夫:《魏源经世思想考》,《史林》,54卷6号(1971年11月),页33-71。大谷在文章中的页34-36讨论了中国与日本对魏源的研究,又请另参 Wakeman, “The Canton Trade and the Opium War”, pp. 182, 84.

十八世纪常州公羊学派藉由魏源、龚自珍(1792 - 1841)以及十九世纪初的“经世派”,而与广州的康有为(1858 - 1927)、梁启超(1873 - 1929)加以联系起来。

最近有人质疑根本就没有“公羊经世学派”的存在。波拉克克(James Polachek)注意到十九世纪初“经世派”的成员并不是学术运动的成员,而只是那些“主要在官场与政治关系的网络中运作,亦即其功能至少就部分而言,只是为了促进个人与事业的利益所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文人团体”。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团体中的某些成员对今文经学的志趣已经被夸大。

争论的双方都忽视了所谓的今文(或公羊)经学在清代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争论的一方从当时的角度出发,认为像今文经学这样重新复起的“强而有力”的新思潮在十九世纪大受欢迎是因为它合法化对时政的批评,而且也使对现有体制的改革得以可能。争论的另一方则由于否认这种观念的并时结构的存在,从而忽略如下的基本事实,即今文经学是两世纪以来清代学者辛勤研究所累积出的朴学证据(philological evidence)的产物。不了解再现于十八、十九世纪的今文经学所仰赖的技术的、朴学的因素,就会倒因为果地误解公羊学进入晚清社会和政治理论领域的方式。墨子刻(Thomas Metzger)近来宣称“外在宇宙的信仰”(faith in the “outer cosmos”),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西方技术的到来,今文经学就不可能生根发展,但这种说法却轻易地忽略了十八、十九世纪关于汉代今古文之争的构

造。

在我们将清代今文经学肯定为“改革主义”,或将其贬抑的一文不值之前,有必要先对清代朴学与考证领域的转变状况加以分析,这方面需要更多的研究。

以学海堂作为参照的框架,可以清楚的描绘出某些以今文经学为根柢所累积的学术动态。举例来说,任教于学海堂的学者们从长江下游的书院传授给学生的经典教育中,吸取了最新研究趋势。因为缺乏广泛的清代经学著作的集成来让学海堂的学子学习,经过四年的收罗与编辑,《皇清经解》(也称为《学海堂经解》)终于在道光九年(1829)刊刻出版了,并且立即受到广州及其它地区的士子们高度赞赏。

这是一部由 70 余位作者所著,包含了 180 种著作,共计超过 360 卷、1400 多页的庞大丛书,《学海堂经解》代表十七、十八世纪汉学学者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它有意承绩长久以来倍受尊崇且包括宋代之前学术成果的《十三经注疏》,并且针对清初由徐乾学(1631 - 1694)所辑录的另一部同样大部头的《通志堂经解》加以回应,该书被视为较偏尚宋明新儒学的经学。

由考证大师顾炎武(1613 - 1682)、阎若璩(1636 - 1704)的著作伊始,《皇清经解》收录了许多与汉学运动有关的著名学者的著作,如惠栋(1697 - 1758)、广文弨(1717 - 1796)、戴震(1724 - 1777)、钱大昕(1728 - 1804)、段玉裁(1735 - 1815)和孙星衍(1753

Liang Ch'i-ch'ao(梁启超),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 (《清代学术概论》,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59), pp. 88 - 95. Translated by Immanuel Hsu(徐中约).

James Polachek, "Literati Groups and Group Polit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Univ. of Calif., Berkeley Ph.D. in History), pp. 2 - 3. 在这个论点上我深受孔恩(Thomas Kuhn)科学史著作的助益,请参见他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0), 又另参孔恩最近出版的 *The Essential Tension: Selected Studies in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Change*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7)。朴学当然不是自然科学,但从客观的、经验的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朴学(语文学)及其历史在中国的发展是可以从科学史的视角来加以充分地研究。

Thomas Metzger(墨子刻),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77), p. 218. (译案:中译本见《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颜世安、高华、黄东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页 208.)

清代朴学的研究包含了几个运用考证学方法的研究领域,这些辅助的学问包括金石学(epigraphy)、音韵学、辨为学(authenticity)、校勘学(collation)、目录学(bibliography)、历史地理学、历史语言学等。对清代朴学(语文学)领域及方法的讨论可参见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台北:达东图书公司,1968),第 1 集,页 383 - 412。我现在埋首研究的学位论文正是这个课题。《皇清经解序》,页 1b。

林伯桐等:《学海堂志》(香港:亚东学社,1964),页 28b。在刻刊之后,这套书迅速的传到朝鲜和日本,参藤濂郝:《清朝文化东传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页 395 - 398。国会图书馆收藏中国图书始于 1869 年(同治八年)六月,当时满清政府捐赠超过九百余册的图书给美国政府,以回应美国所倡义的学术交流的要求。美国官员原来所要求的是关于人口调查与税收等方面的资料,但遗憾的是,中国政府送来的却大多是儒家经典与礼仪的书,而《皇清经解》正是其中的核心,参 Ping - kuen Yu(余秉权)所编: *Chinese collection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1974, 3 vols.), / - an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n 'od, p. 401. 汉口富士雄:《方东树の汉学商兑卷绕つて》,《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第 15 册,页 73 - 890。

Cheuk - woon Taam(谭卓垣),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pp. 73 - 74, 《十三经注疏》也是由学海堂所再刊行的,目的在消解宋明经学的影响。

- 1818)等,而这种为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以上提及的这些人皆与尊崇郑玄、许慎等人的清代古文(东汉)经学学派有所瓜葛。

然而,致力于何休和西汉学术的常州今文学派的学者所撰著的一些著作也被收录在这部经解中,如庄存与(1719-1788)的《春秋正辞》、孔广森的三部著作(包括《春秋公羊通义》)、刘逢禄(1776-1829)的七部著作(包括《公羊何氏释例》和著名的《左氏春秋考证》),以及凌曙(1775-1825)的两部著作(包括《公羊礼说》)。

阮元本人也与常州学派的许多学者们保有私人的交谊,虽然他们这些关系的意涵仍然不十分清楚。刘逢禄曾敦促阮元刊刻《十三经注疏》与《皇清经解》。凌曙曾是刘逢禄公羊学的追随者,他后来担任阮元的幕僚并兼其子的教师,阮元的密友程恩泽(1785-1837)除了是一位著名的考证学者之外,同时也是今文经学理论家的老师。孔复礼(Philip Kuhn)和琼斯(Susan Mann Jones)指出,程恩泽在北京的学人圈中包括刘逢禄、魏源和龚自珍。我们上面也曾经提及阮元对孔广森的赞美。

虽然上述对汉学与今文学关系的观察是初步且琐碎的,但这却建议我们必须开拓对清代朴学的理解,并且准备将常州公羊学者视做考证学运动的一部分。处于汉学与宋学的分界线,公羊学发皇于以常州庄氏家族为中心的学者小团体,而他们学问的根只就在于使用考证学方法来从事精密的典籍研究。若没有运用经验的方法,常州学派的学者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并不会被严肃的看待,而将其置放

在《皇清经解》其它汉学家的所作之旁。

考证学的方法在十八世纪广泛使用,其时被认同的学术论述的形式已经被改变了,缺乏系统方法论论证的论著不复获得学术的尊重。这点对于汉学和反汉学的著作都是千真万确的,如方东树(1772-1851)于道光四年(1824)献给阮元的《汉学商兑》就是如此。考证不是某一学派的专利。<sup>⑩</sup>

经学研究对于经书辨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很明确的一致看法。最初学者们将其研究范围聚焦在明确的课题上,然而到了学海堂建立的时候,一个清楚的学术方向开始显现出来了。为了要恢复与重建古代经师透过典籍研究所得到的原始教义,在十七、十八世纪时,探取回归东汉注释传统的作法。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学者延续这样的努力,开始将他们的知识前沿和关注点推回到西汉的学术,将其视为经学研究更好的源头。<sup>⑪</sup>

魏源就是此种学术转变的很好的例子,身为刘逢禄的弟子,魏源为了迄今仍不清楚的理由,背离他的老师推尊何休《公羊解诂》的作法,取而代之的是转向董仲舒对《春秋》“更完善”的著作,这引导他直接回到西汉的今文经学。<sup>⑫</sup> 汉学研究的一致性至此结束。阮元以何休“学海”的称号为学海堂命名,就是当时学术逐渐从东汉郑玄及古文经学派撤退的象征。

关于辨的问题所累积的大量著作,提供了学术圈日益尊重今文经学的基础。阎若璩和惠栋戏剧性地证明了《尚书》的古文经篇章为后出的伪作,诂经精舍及学海堂都接受了这样的看法。<sup>⑬</sup> 朱次琦

参《皇清经解》目录。

参桥本成文:《清朝尚书学》,收在《汉文学讲座》,第5册(1933),页10-27。

参《皇清经解》目录。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 519.

Ibid. p. 535, 凌曙也会替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做过注解,该书是今文经学的主要典籍。

Hellmut Wilhelm (卫德明), "Chinese Confucianism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Encounter," in *Changing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Modernization*, edited by Marius Jans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65), p. 307.

Kuhn & Jones, pp. 155 - 56.

Wilhelm, p. 307.

Ibid. Cf. Kuhn & Jones, p. 156, 庄述祖(1751-1816)是庄存兴的姪子,也是常州学派的成员,曾写了《毛诗考证》一书,后来被收进《皇清经解续编》。庄述祖与常州学派的关系参见内藤虎次郎:《支那学问の近状》,收在《内藤湖南全集》(东京:筑摩书房,1969-74),第6册,页51-52。

⑩ Kuhn & Jones 指出,在魏源的時代,今文经学“仍与重视典籍研究的汉学主流相近,而与后来康有为所倡导的乌托邦、孺赛亚式的今文经学支流相距较远”,见:“*Dynastic Decline and Rebellion*”, p. 151, (中译本见《剑桥中国史》,第10册,《晚清篇上》,页178。)

⑪ 周予同:《经今古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页28-29。这个学术方向在结构上类似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回归古典拉丁与希腊作家的运动。

⑫ 魏源:《董子春秋序》,《古微堂内外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外集,卷1,页63b-64a。

⑬ 对阎若璩的赞美可参见《学海堂集》,一集,卷6,页3a-4b。(译案:作者所引不见于原书,疑有外误,待考。)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被收进《皇清经解》,亦参《诂经精舍文集》,页313-332。

(1807 - 1882) 承认: “《书》伪古文, 乱经也”。魏源在他的《书古微》中更进一步提出怀疑, 认为不只阎若璩和惠栋所指认的东晋 (317 - 420) 古文经篇章为伪作, 甚至连东流古文经学家郑玄等人所看到的较早的版本也属伪作。

刘逢禄沿续其外祖父庄存与的研究, 并且断定《左传》原来并非孔子《春秋》的传注。刘逢禄指控刘歆 (公元前 45 - 公元 23) 将《左传》从《国语》中抽取割裂出来, 并且肆无忌惮地使它为《春秋》的正统传注, 企图驱逐盛行于西汉的今文经学。根据刘逢禄的说法, 刘歆用这样的方式将《公羊传》从太学中移除开, 而代之以伪造的古文经传。

这样的论辩在儒学书院中引起了极大的波澜, 陈澧 (1810 - 1882, 道光二十年 (1840) 的学海堂学长) 在对这个问题的辨析中, 针对刘逢禄的《左传》批辞及其过份依赖何休解说的作法加以回击。然而, 从陈澧的反击中却可以看到刘逢禄的论旨是受到重视的, 而且在广州重要到必须要加以反驳。陈澧在学海堂的学生桂文燦 (1823 - 1884) 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著作中走的更远, 企图藉由将惠栋联系到今文学, 而将戴震联系到古文学的方式来区分汉学运动。

龚自珍也曾同魏源一起受学于刘逢禄。对《周礼》的怀疑始于宋代, 但却复兴于清代, 龚自珍继续争辨《周礼》并非西周初期的文本, 也不能直接联系到周公。根据龚自珍的观点, 直到刘歆的阴谋在王莽的短期统治 (9 - 23) 中获得奖励以前, 《周礼》都不被视为经书。

邵懿辰 (1810 - 1861) 步武同样论辩的线索而写

了《礼经通论》一书, 其中他强调刘歆曾假造了《逸礼》三十九篇。而在他对《书经》的研究中, 邵懿辰论证刘歆也伪造了被像郑玄这类的东汉古文学者视做《逸书》的古文篇章。

回归西汉的源头也再次点燃了关于《毛诗》与今古文《孝经》的争辨。曾被阮元邀请到诂经精舍讲学的陈寿祺 (1771 - 1834), 除了企图回复《今文尚书》外, 也开始研究西汉的《三家诗》, 而这最后由其子陈乔枏 (1809 - 1869) 所完成。陈乔枏研究的结论指责郑玄对《毛传》的任意改动, 因而有必要恢复较早的《三家诗》。十九世纪中叶, 魏源完成了他的《诗古微》, 在此书中他发起了对《毛传》和《大小诗序》的直接攻击。魏源尝试证明后者皆为后出的伪作, 并且在可靠性上不能与齐、鲁、韩《三家诗》相提并论。<sup>⑩</sup>

学海堂的成员也涉及郑玄《孝经注》的争论,<sup>⑪</sup> 争论的重点在于西汉的古文经版本是否优于郑玄的后汉今文经的版本, 但二者其实都被怀疑是伪作的。<sup>⑫</sup> 呼应唐代的《孝经》争论, 学海堂学者反对将西汉的版本与伪《古文尚书》联系起来。<sup>⑬</sup>

《古文尚书》的辨伪关系到长久以来对王肃 (195 - 256) 系《孔子家语》的作伪者的怀疑。<sup>⑭</sup> 这是因为《尚书伪孔传》的观念相类似于王肃的理论, 使得某些学者, 如丁晏 (1794 - 1875) 在他的《尚书余论》中便直指王肃就是《尚书伪孔传》的作伪根源。因为《孔子家语》清楚地反映王肃的理论以及他对郑玄的反对。丁晏总结王肃必定是《古文尚书》与《孔传》, 甚至是《孔子家语》的造伪者。<sup>⑮</sup> 根据这种论证的线索, 王肃在《孔子家语》中充斥着排拒视孔子为素王的不足凭信的看法, 因为他发现把孔子当做半

《清儒学案》, 卷 171, 页 7b。(译案: 作者原文误植为页 9b, 今据原书改之。) 虽然朱次琦于道光十四年 (1834) 获选入学海堂肄业, 并于咸丰九年 (1859) 获聘为学长, 但对此二者他都拒绝了, 理由是因为他反对由阮元在那里所建立而盛行一时的汉学方向, 参《学海堂考》, 页 46。周予同:《经今古文学》, 页 32。

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皇清经解》, 卷 1294, 页 1a; 卷 1295, 页 4b - 5a。最好的讨论仍是 Henri Maspero 的 “La composition et la date du Tso Tchouan”, in *Me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Brussels), (1932): 137 - 215 but especially 139 - 54。

《清儒学案》, 卷 174, 页 29a - 32a。

《清儒学案》, 卷 175, 页 34b - 35a。(译案: 原文是 “国朝经学远达千载, 治经者有墨守之学, 有宏通之学。为墨守之学者如定宇惠氏是也, 汉之今文家似之; 为宏通之学者, 如东原戴氏是也, 汉之兼通古今家似之。”)

宇野精一:《周礼刘歆伪作说》,《东亚论议》, 第 5 辑 (1941 年 10 月), 页 250 - 54。

《龚自珍全集》(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75), 页 37。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 第 2 册, 页 597; 另参周予同:《经今古文学》, 页 32。

皮锡瑞:《经学历史》(香港: 中华书局, 1961), 页 320。

⑩ 汤志钧:《清代常州经今文学派与戊戌变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香港: 崇文书局, 1971), 第 2 册, 页 71。

⑪ 《学海堂集》, 二集, 卷 7, 页 15a - 22a, 23a - 26a; 四集, 卷 11, 页 10a - 14b。

⑫ 关于今古文《孝经》的讨论请参 William Hung (洪业), “A Bibliographical Controversy at the T'ang Court A. D. 719”, in *Havard Youmal of Asiatic Studies*, 20.1 & 2 (June 1957): 74 - 83。

⑬ 参侯康 (1798 - 1837):《孝经古义考》,《学海堂集》, 二集, 卷 7, 页 15a - 22a。

⑭ R. P. Karamers, K'ung - tzu chia - yU. *The School Sayings of Confucius* (Leiden: E. J. Brill, 1950), pp. 15 - 36。

⑮ Ibid., pp. 33, 164, 192 - 95。

神的想法并不能被他自己理性主义的气质所接受。

回顾上面所讨论的种种发展演变,严格来说并不是哲学的或理论的,而是朴学的,与典籍之学的特定领域紧密相关的。即使在与今文经学相关的学术范围之内,也还是没有清楚的一致意见。庄存与仍旧接受《古文尚书》的文献价值。刘逢禄以何休为其公羊学的基础,而正因为孔广森的某些观点与何休不同,刘逢禄便对孔广森的公羊学加以批评。魏源也背离了何休的《公羊解诂》,且龚自珍亦心满意足地视《左传》为《春秋》的可靠传注。在康有为之前,我们没有证据看到经学会以今文学或公羊学之名被广泛接受的这样一种系统而连贯的经学观。

目前研究的层面确切显露给我们的,却是被称为《今文经学》的一种一贯的朴学资料主干的纲要(the outlines of a coherent body of philological da-

ta),那正是廖平(1852-1932)与康有为想要刻画的这种知识主干(body of knowledge)。今文经学并非因西化冲击所产生的合理化产物。今文经学关系到改革问题之前,最初只是兴起于学海堂之类的主流学术中心,而被视为值得尊崇的某种儒学研究;且在成为激进回应西化的组成部分之前,其种种面向就已与传统儒学的改革有所牵连了。

这些朴学的议题与学海堂所提供的教育密不可分。除了训练地理学家与军事战略家之外,学海堂也是一个经学的论坛。学海堂是一个多元的教育机构,在那里宋学与汉学的课题被讨论,而且今文经学也被研读与重视。<sup>⑩</sup>当出身诂经精舍的浙江学者朱一新(1846-1894)来到广东就任张之洞(1837-1909)于光绪十六年(1890)新设立的广雅书院的山长时,他对早已出现在广州而使广东成为清代经学最前线的根本转变发出了赞美。<sup>⑪</sup>

此文的较长的版本曾于1978年10月28日在华盛顿特区所举办的the Mid-Atlantic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AAS上发表。我要感谢《经学、历史与政治:清代今文学》研究小组的成员,Dorothy Borei教授与Richard Howard博士的评论和建议。实质的修改则吸收了广州大学的Susan Naqmn(韩书瑞)教授、W. Allyn Rickett及Nathan Sivin在这段期间所给予的忠告与指导。此外,我也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Peter Bol。这篇论文的大部分研究是在东京的东洋文库完成的,我要向夏一雄教授与东洋文库的工作同仁所提供的协助致上谢意。(译案:此文原刊载于Ching-shih wen-ti, 4, no. 2(1979. 12), 原题作“The Hsueh-hairang and the Rise of New TeXt Scholarship in Canton”。)

Ibid. pp. 169, 194-97, 327.

Liang Ch'i-ch'ao(梁启超),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清代学术概论》), p. 91.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第2册,页599;另参汤志钧:《清代常州经今文学派与戊戌变法》,页69.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 519.

《龚自珍全集》,页234。

这种重建是不可能的,但在能证明这个并时结构之前,这种努力需要一种理想的历史研究,关于清代公羊学所存在的若干差异,请参福家弘:《清朝公羊学に就て二题》,《汉文学会会报》,第4辑(1936年3月),页134-58。假定常州学派成员(与公羊学成员)具有结构相似性的基础是一回事,但是论证他们的事实内涵却是另一回事。

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39期(1950年12月),页177-226,该文提示了政治上的今文与学术上的今文学的区分。

Joseph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 of Calif. Press, 1968), 79-94. (译案:中译本为《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青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See David Nivison(倪德卫),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ueh-cheng (1738-1801)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66), pp. 148, 283. (译案:中译本为《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杨立华译,邵东方校订,台北:唐山出版社,2003。)

⑩ 麓保孝:《清末に於ける鋸南の儒風》,页210-11, 212-20。学海堂本身及整个广州已变成众所皆知的,将汉学的研究方法和宋学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关怀加以调和的中心。《学海堂集》中充斥着讨论两宋思潮的文章,例如林伯桐(1775-1845)对大多数古代经书何以不言性之尖锐的讨论。(见《学海堂集》,一集,卷2,页6a-10b。)阮元对宋学兴趣的讨论请参何佑森:《阮元的经学及其治学方法》,页19-20。林伯桐企图调和汉学和宋学的差异,但他也赞赏像钱大昕之类的汉学家在音韵学和古韵方面的贡献,参《学海堂集》,一集,卷6,页28a-29b。林伯桐在学海堂最著名的学生陈澧也沿着其师折衷调和的治学道路,参 Ying-sunmh(余英时),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 in Tsing-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1(DEC. 1975):113.

⑪ 麓保孝:《清末に於ける鋸南の儒風》,页219-20;亦参 Hao Chan(张灏),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